

# 两位书记的耳光，“打”出的为官境界天上地下

本报评论员

河南济源

市委书记掌掴市政府秘书长，让公众大跌眼镜。目前，当地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公众期待一个有信服力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不少网友都在热传多年前另一个“书记扇耳光”的故事。两个书记，两个耳光，打出截然不同的回响，天上地下之差令人深思。

2018年7月3日，《菏泽日报》刊发当地媒体记者讲述的一段往事：改革开放初期，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到村里看望一位重病在身、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丈夫和三个孩子的老奶奶。询问这位做过杨得志将军的

房东、曾一天为将士做过9顿饭、不惜变卖嫁妆也要让将士吃饱吃好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掏钱帮老人满足愿望，回到县委开会，说起这位为中国革命做过重要贡献的老人，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猪肉，周振兴突然抬手扇了自己一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

在济源“市委书记掌掴市政府秘书长”事件后，40余年前“要脸”的书记自打耳光的“旧闻”引发刷屏，即使不看网友跟帖，“有声”的耳光已经有了无声的答案。

周振兴书记的耳光，打出的是共产党员的良知，他觉得百姓没能吃饱吃好，是因为自

己工作没做好，心里满是自责和愧疚，觉得共产党的书记如果不能为人民谋幸福，愧对人民愧对党；而济源这位书记的耳光，打出的是专横跋扈，无论起因，都与党员领导干部的身份格格不入，折射出权力任性下的作风粗暴、颐指气使。

同样是耳光响亮，“打”出的为官境界天上地下，谁是公仆情怀，谁是耍权弄威，人民群众洞察秋毫。自打耳光的书记，烛照出共产党人不忘人民的初心和担当；打人耳光者，抑制不住的是“官老爷”的狂霸，凛凛“官威”背后是扭曲的权力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许许多多像周振兴书记那样人民至上、情系苍生、初心永驻的公仆，我们党才能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少数领导干部耍官威、做“老爷”，背离初心使命，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推进作风建设、开展初心教育要解决的问题。

人们翻出旧文，钩沉往事，积极转发，既希望通过对比，表达对“掌掴闹剧”背后变味权力观的深恶痛绝，更是希望以周振兴老书记自扇耳光的故事为初心教材，启示领导干部如何为官，如何牢记初心使命，让我们党永远不负人民。

草野·宇下

姚孝平

村里抛荒的地真不少

以前，农民眼中的土地很金贵，种桑养蚕、种油菜小麦，一年四季有忙不完的活儿。每家都把地种得满满的，哪怕有一点缝都要种点大蒜、茄子。农民靠天吃饭，衣食用度都要从地里来，谁家地里杂草多了，会被其他人指指点点。

这几年，村里抛荒的地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外打工、做生意，家里的土地全靠老人支撑着。有的老人也在外打零工，加上年纪大了干不了体力活，有空就种一点，没空就让它荒着。

土地的产出慢而有限，比不上打工来钱快又多，久而久之，土地成了

一些农民眼中的鸡肋。眼下正是冬忙时节，但田里已没什么人影，老人们多聚在一起晒太阳、聊天。

以前，村民为有一点有争议的地，甚至会大打出手，现在白给别人都不要。不少村民把田出租给别人种树，租金每年一千块一亩。有的地位置不好，没人愿意租，只好荒着。农民自己很难为那些抛荒的土地找到出路。

我有时在村里散步，看到很多地都荒着，没种一点作物，心里也不是滋味。这些土地，往年都种小麦油菜等作物，现在都空荡荡的，只有鸟儿时常飞来觅食。

国家非常重视耕地保护，强调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防止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针对农村土地抛荒现象，我得村委会可帮忙联系农业合作社和一些蔬菜承包大户，把农民闲置的土地租下来。

如今很多地方拆迁了，一些有精力又有资金的农民无事可做。其实，如果他们愿意承包土地来种蔬菜搞农业，有机蔬菜价格贵也有得赚，还能满足本地消费者，再雇些本村留守老人锄草施肥，让他们在家门口赚点钱，也不让土地撂荒，岂多双赢？

■ 稿件启事

为体现开门办报，《新华每日电讯》“草野·宇下”栏目长期征集读者来信。我们期待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故事，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体的声音，尤其欢迎来自基层的生动细节，反映时代进步的细微变化。愿用我们有限的版面，撑起一方公民发言的舞台。

邮箱：xhmrdx@163.com。来稿请注明“草野·宇下”，请勿使用附件。

新华社记者

王井怀、黄江林

河北、黑龙江等地的疫情牵动人心。在流调结果中，“婚宴”成了高频词。为此，各地纷纷喊出“婚事缓办”的口号，但由于即将到来的辛丑牛年是迷信说法“寡年”，还是有不少新人把婚期提前到腊月，形成扎堆结婚现象。

提前办婚礼的声音在网上有不少。有网民说：“因为明年是寡年，1月10日前要参加3个婚礼”；还有网民留言：“本打算明年结婚，但家人不同意，非得今年结婚”。

所谓“寡年”，又称“寡妇年”或“哑年”，指农历“立春”节气早于春节的年份。比如即将到来的这个辛丑牛年，大年初一是公历2月12日，而此前的2月3日就“立春”了，这样就等于一年到头没有“立春”。在一些地方的旧观念里，这样的年份结婚不吉利，碰上牛年的“寡年”则更甚，有“寡年碰金牛，饿死猪与狗”的说法。

“寡年”自然是无稽之谈，左右不了新人的幸福，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迷信这种说法。有些人对疫情心存侥幸，而对迷信“宁可信其有”，明知疫情当前聚会风险大，却不仅扎堆

办婚礼，而且要大宴宾朋，造成本可避免的疫情防控隐患。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年轻人已经为防控疫情推迟婚礼。河北磁县一对新人推迟了原定于1月18日举办的婚礼，向亲戚群发消息“婚宴延期，但婚期不变、爱不变”，受到乡亲们点赞。银川市的一个区先后有十几

对新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

对“寡年”仍然心存芥蒂的朋友，不妨听听另一句俗语：丁是丁，卯是卯，啥时拜堂啥时好。只要情比金坚，每天都是好日子。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疫情消散的时节，让亲朋好友见证人生幸福时刻。

新华社天津1月19日电

## 低风险区防疫勿“加码”

本报评论员周闻韬

春节临近，随着近期多地出现新的新冠肺炎聚集性病例，各地防疫措施相应“升级”，但在一些低风险地区，防疫政策的五花八门给民众带来了不少“烦恼”。

这样的五花八门表现在省会城市和地级市间的防疫尺度存在差异，不同区县出台的政策也不一。以办酒席为例，记者梳理发现，有的要求除红白事外，其他酒席一律禁止操

办和参加，有的则并未严格限制；而在出行方面，在倡导就地过年的大背景下，针对来自低风险地区返乡群体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持健康码绿码即可通行，有的则要求提供3日或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面对纷繁复杂的防疫政策，一些媒体进行了归纳梳理，还有热心人士制作了过节攻略，但难免让民众犯迷糊，引来不少吐槽和调侃，也与精准防控的要求背道而驰。

不可否认，相关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为

防疫大局着想，是为巩固来之不易的战疫成果，但如果能在制定时树牢系统思维、精准精细防控，或许能让这个春节过得更有人情味。

政策越系统越精细，防疫才能更有力。当前疫情防控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绝不能因为形势的变化而自乱阵脚。随意“加码”、各自为政，不仅难以让民众信服，也会加重基层防疫人员负担，给防疫留下漏洞，加剧传播风险。

## 别把“说了”当“做了”

本报评论员汪伟

近日，沈阳市一位领导在某次会议上质问参会干部：“我们中是不是有些人把说了当成做了，把做了当成做了，把做成了当成做好了？”直击灵魂的发问，点出了基层工作中一些问题，值得深思。

把“说了”当成“做了”，是形式主义在基层工作的直接表现。一些干部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上级领导部署“五项任务”，他们马上就能弄出“六大举措”。但实际上，举措悬在空

中，行动停在嘴上。更严重的是，一些人摆拍照片，虚报数字，欺上瞒下，把工作彻彻底底变成了口头汇报和做表面文章。

把“做了”当成“做成了”，表面看是工作作风不严不实，实际上更是更隐蔽的形式主义。这是慵懒散作风的外显，危害性更大。一些干部刚开始做某项工作，就已经开始准备总结材料、成功经验。

把“做成了”当成“做好了”，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体现，是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出了问题，是缺乏精益求精、较真碰硬态度的具体

体现。一些工作表面看完成了，甚至汇报材料写的是“做好了”，但效果评估不理想，群众不满意。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干好基层工作需要有一颗“绣花心”。

干工作重在抓落实、抓落实重在后面的“实”。当前，改革发展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时间紧、任务重、矛盾多、困难大。面对新形势，干工作既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又要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推动工作。

扪心自问，有多少基层干部听到这个问题会脸上火辣辣？

## 耕地占补平衡不能玩“占优补劣”游戏

本报评论员周楠

近日，有网友在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栏目反映，一些地方在推进耕地占补平衡项目时，组织村民开荒造田，将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变成农田。记者调查发现，为集约节约使用土地、守护耕地红线，国家财政投入了真金白银，但一些地方执行政策有偏差，出现了劣地换好地、旱地换水田、荒地换良田等荒唐事。

有的基本农田上了山。一些地方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将城镇郊区的高产农田圈占，把贫瘠、易旱的地块补进基本农田，甚至在山地上开荒造田。有群众质疑，土壤肥沃、连片平整、亩产上千斤的良田，被换成地力贫瘠、小块分散、亩产三四百斤的“望天田”，这算什么占补平衡？

有的基本农田下了水。一些地方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在河滩、湖洲划出所谓基本农田。水位上涨时，这些农田大面积甚至全部被淹，无法耕种；水位没上涨时，也因受冷水浸渍，容易成为低产冷浸田。

有的基本农田进了房。一些地方将农村“空心房”整治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合起来，但一些地方完成拆旧任务后，复垦质量不高，甚至长期没有真正复垦，房屋拆除后原宅基地荒芜，复垦空有其名。

有的基本农田上了山。一些地方政府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只看眼前利益、不谋长远利益。他们认为，工业化要地，城镇化也要地，占用城镇郊区农田难以避免，通过开荒造田、拆房复垦能给本地增加城镇用地指标，还能通过流转交易土地节余指标获得收益，何乐而不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耕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我国人多地少，更要倍加珍惜耕地资源。如果耕地红线出了问题，粮食生产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危害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

耕地“上山下水”，问题在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错位。中央反复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眼里，农业投入大、见效慢，不如抓工业化、城镇化容易出政绩。在这种政绩观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把好经念歪了，出现占优补劣、占多补少的“数字游戏”。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牢牢守住耕

地红线。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红线，也应该是质量红线。只有全面守住这条红线，我们才有底气说“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如果放任基本农田“上山水下进房”，耕地隐性流失问题日益严重，我们就很难端牢中国人的饭碗。

近年来，有关部门持续清理整治大棚房、乱占耕地建房，遏制耕地“非粮化”，效果明显，但治理耕地乱象仍须持之以恒。具体来说，要明确责任主体，对耕地质量进行动态监控；要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进一步压实粮食主产区的责任；要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健全产粮大县奖励政策；要持续压实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稳定粮食生产责任，让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都能得到合理回报，强化守住耕地红线的动力。如此，才能真正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孩童托管看似琐碎小事，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不能一股脑儿把托管这事扔给家长，或是通过经济手段扔给社会，政府和学校要想方设法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中坚们排忧解难。

每日快评

本报评论员何晨阳

最近，两场特殊婚礼在网络刷屏：没有婚纱礼服，没有满座宾客，河北邢台交警王穆和妻子用1分钟完成婚礼仪式后，迅速回到防疫一线执勤；没有伴郎伴娘，独自走进新郎家，河南商丘新娘模范遵守防疫要求，获得众多网友点赞。

按照传统的婚俗，这两场婚礼确实很简单，甚至有些“孤独”。但是，这两场婚礼不仅上了热搜，还收获了满满的祝福。究其因，前者展现了特殊时期防疫人员的无私奉献与尽职尽责；后者体现了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持防疫工作。

疫情防控无小事。当前，疫情多点散发，形势依然复杂，不可马虎大意。结婚是人生大事，能热热闹闹当然最好。但在特殊时期，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短期的不便与长久的平安之间，应该如何理性选择，答案已经很明显。

近期，不少地方明确特殊时期“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理解。但也有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坚持大操大办。这些人辜负了那些为防疫默默付出的人，必须谴责。

每个人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及家庭，更关乎防疫大局。在当前形势下，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不留防疫死角，就是在给抗疫作贡献。

西欧有无小饭桌？

孩子课后怎么管？

本报评论员吴黎明

好望角

最近，北京市先后通报了多名儿童确诊新冠的消息，流调发现他们曾在确诊病例家庭的“小饭桌”托管。相关报道引发了舆论对孩童校外托管的热议。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孩子在比利时上学时的情形，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女儿三岁进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压根没有入托费之说。后来上小学时，选择的是离家不到500米的一个公立学校。学校下午三点半放学，但也可以等到五点再去接。在此期间，学校不再分班授课或辅导，而是让学生集中在大教室里自习、做作业，也有学生在操场参加体育运动的。学校概不收费。

开学后不久，女儿说，每天三点半之后的自习时间，老师会把她和另外几个“外国小朋友”喊去补课。原来，由于语言环境不同，他们的法语比当地孩子稍差一些，老师会给他们讲故事，以便提高他们的法语水平。我也曾担心是不是要交钱，但从未见到学校的账单。

后来，我的一位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做研究的教授朋友告诉我：“不要钱，老师是自愿的。”原来，他的孩子当时刚转到比利时来上学，法语更差，学校为了让他跟上班，自愿给其补课。“比利时都这样。”他说。

我女儿一共补了大约一个学期，从未接到账单，也未见到老师向我们家长“表功”。也许学校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小女上小学，除了午餐费以外，没有其他费用。小学每两周一次游泳课，每个月有一次外出活动，比如骑马、访问农场、看演出之类，都不要钱。

据笔者了解，西欧各国情况大同小异，目的是方便上下班的家长接送。法国同事说，法国小学是下午四点放学，但学生可以在校自习到六点，不收费。

换言之，西欧各国没听说有收钱托管孩童的机构，因为没有这需求。

学校托管孩童，在欧洲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的理念里，养育孩子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政府和社会要想办法方便家长、方便孩子。

西欧也有少量福利性质的托管机构。在布鲁塞尔时，我常看到一些孩子到楼下公园对面的一座房子子里玩，房子门口的标牌写着“儿童之家(Maison de Enfants)”。一打听，才知道这里周末、周三下午和假期免费让孩子们来玩，也算是托管吧。那里环境谈不上高大上，只有普通的玩具和图书，还有一男一女两位老师负责管理。“儿童之家”还组织孩子们看电影，参观农场甚至骑马之类，而且每次只收2欧元的公交车费。暑假是欧洲人度假的日子，但总有一些家庭因种种原因不能带孩子到外地度假，“儿童之家”就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当然，这里没有文化辅导，在中国家长看来有些荒废学业，我们送过几次也就作罢了。

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孩童托管看似琐碎小事，但对一个家庭来说却是天大的事情。不能一股脑儿把托管这事扔给家长，或是通过经济手段扔给社会，政府和学校要想方设法为创造财富的社会中坚们排忧解难。

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让学校承担孩童下午托管的重任，是最实用、最经济、最安全的做法。靠社会化服务不仅让家长多花钱，而且人身安全方面也让人不踏实，甚至会对孩童的心理与价值观取向造成负面影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要让孩童从小就形成让钱解决问题的观念，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不妨多一些责任与担当，多送一些温暖。